

16 11

許昌文史資料

第二十一輯



许昌文史资料

第 21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许昌市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007 年 11 月

主 编:张运昌
编 委:(以姓名笔画为序)
王中禄 王文灿 杨付根
郭书营 董 才 程雪峰
编 辑:王小宇

许昌文史资料 第 21 辑

编 辑:政协许昌市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 刷:许昌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文印中心
开 本:1/32 大
印 张:7
印 数:2000 册
豫内资许新出通字(2007)A012 号 内部交流

目 录

人物春秋

我的父亲宋聘三	宋福国(1)
乔金岭和他的“黄河”事业	路志纯(14)
民国时期爱国济民的卷烟企业家宋世来	
..... 周福乾口述 荣冰 韩建坤执笔(45)	
王云事略	徐开伟(64)

难忘岁月

在京亲见毛主席周总理的回顾	
..... 郑万敬口述 张利敏 郑松亚整理(67)	
追忆马季大师	郑万敬(71)
我的“文革”历闻	陈书壮(74)
回忆在长葛政协工作的岁月	郭幸时(96)

无悔青春

鲁山县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始末概述	
..... 张发青口述 李玉震执笔(125)	
忆在广阔天地的日子	舒春霞(138)

历史回眸

许昌地区的“四清”运动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	
..... 刘天骥(142)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许昌城的接管 马木旺(149)

珍贵档案

中国烟草生产开山之作——《美种烟叶指南》 刘子芳 徐红晖(157)

文教天地

我的母校许昌回小 艾荣泉口述 艾泮田整理(175)

教育世家 百年树人——许昌丁氏家族百年教育传承纪事
..... 丁宇生(182)

许昌曲坛名人录 贾凤翔(188)

建国后反映许昌经济社会发展影视作品一览(上)
..... 芦应强(198)

用清水在大地上书写华章——记许昌的地书及其爱好者们
..... 汪洋(210)

抢险救灾

难忘的特大洪水灾害 张水旺(214)

许昌市建国后文史资料征编选题纲目 (220)

我的父亲宋聘三

宋 福 国

我的父亲原名宋五诏，号话删，笔名爰爰轩，曾用名品三、品山、拼三，后以宋聘三行于世，1881年10月24日生于禹县（今禹州市）浅井乡浅井村一个富裕家庭。

父亲兄弟三人，他居长。他从小爱听大人们讲洪秀全、李自成的故事，并受家庭的影响，养成性情刚直、敢于向恶势力作斗争的性格。

父亲先是拜田老四为师，后又跟王槐三（举人）读书。他刻苦钻研，勤奋好学，通读了四书五经，因而成为秀才。他对诗、赋、书、画颇有造诣，尤其对汉、魏、隶等书法颇有研究，求他写字的人很多。他还长于镌刻，常在自己的文具上自写自刻诗词，以表素志。

1904年，父亲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在那里，他读了不少进步书刊，接受了许多新思想。一天， he去户部主事宋淑信（禹县火龙庙人，与浅井宋家同族）家。宋淑信以长辈的身份说：“近日来京城方面革命党人活动得很厉害，你可不要乱说乱动，不然的话是会出事的！”父亲果断地回道：“革命党人有什么可怕，他们不同样是人？不过，他们的思想进步，是为了救国救民，改革旧政，推翻清王朝的。你没有看到，中国如果这样下去，就一定要灭亡？”这时，父亲甩掉帽子，继续说：“你看，我已加入革命党了！我要跟随孙中山先生一道革命，推翻清政府，改革旧制度……”宋淑信见父亲已剃为光头，且言辞激昂，句句在理，顿时被吓得面如土色，连忙说：“这样是要被灭族杀头的，你赶快离开。”

在京师大学堂上学期间，每逢节假日父亲回到家乡，即脱掉帽

子，露出光头。在古庙会、集市上或大街上，他当众发表演说，揭露清政府丧权辱国、腐败无能的反动本质，以提高民众的思想觉悟。因此，人们送给他“宋和尚”的外号。在父亲的启发教育下，我族叔宋振亚和一些进步青年跟着他一起走村串户、上集赶会，宣传破除迷信、扒除神庙、提倡放足的好处。经过父亲的耐心说服，我姑宋玉平首先放足。因此，村里人都叫她“大脚平”，婆家人都喊她“宋大脚”。

本村东头石婆山上有一个青石雕刻的石像，叫“风师婆”。父亲带领进步青年将它扒掉了。

1907年，父亲东渡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这其间，他多次拜见了孙中山先生，并参加了孙先生创建的中国同盟会。他阅读了《万法精理》、《法义》及《英国近代史》等书籍以及许多进步刊物，还结交了不少海内外志士。由于他学习认真，革命事业心强，工作勤奋，因而得到孙中山先生的赏识。孙中山先生多次派他去上海、香港、广州、云南等地做宣传鼓动、发展同盟会会员及联络工作。回国后，他在上海办理为中国公学捐款的事宜，并参与了竟业学会主办的《竟业旬报》编辑工作。

辛亥革命前夕，父亲被派回河南，与同盟会会员张鍾端、刘载青、张善岐、刘积学、张钫、李钦五、王从周、李公干等秘密策划，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当时，王从周动员省城各校师生、驻汴军警和仁义会，约定时间以放火鸣枪为号，举行起义。不幸的是，由于叛徒张光顺告密，致使张鍾端、李公干、王天杰等人被捕牺牲。我父亲幸免于难。惨痛的教训使他认识到，要推翻清王朝统治，单靠少数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只有依靠全国人民大众，才能取得成功。

1911年10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推翻了清王朝300多年的统治。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



1912年9月，孙中山先生(前排中)与太原各界人士合影。前排右四为宋聘三，前排右三为景梅九。

1913年，父亲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二次革命”。1914年，父亲在日本东京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组建的中华革命党。

1915年，袁世凯伪造民意，企图复辟帝制。我父亲和其他革命同志义愤填膺，积极参加了反袁护国运动。

1917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我父亲和于化卿奉军政府之命，前往陕西省三原县会见靖国军司令于右任、副司令张钫，共同商议护法大计，并运送武器及军用物资。行至灵宝时，于化卿被镇嵩军刘镇华部杀害，我父亲侥幸脱险。事后，他总结了经验教训，在郑州豫业转运公司设立了秘密机关。不幸计划泄露，一位姓黄的工作人员被捕，后在洛阳被害。我父亲当时往返

于北京、天津、郑州、武汉一带，虽幸免于难，但豫业转运公司被查封了。

1923年，陈炯明叛变革命时，正遇樊钟秀（当时任赵倜部的团长，湘鄂战争爆发后奉赵倜之命援鄂）部开到了广东省。在我父亲的帮助下，樊钟秀率部投靠了孙中山先生，参加了保卫总统府的战斗。事后，樊钟秀的部队被孙中山先生命名为建国豫军^①，我父亲任建国豫军秘书长。孙中山先生颁发给我父亲三等文虎勋章一枚和椭圆形象牙雕刻的镜框（内装孙中山先生照片）一个，以表彰其功勋并作纪念。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我父亲是孙中山先生指定的代表人之一，与刘毅青等一同赴广州参加大会。1月28日下午，我父亲以172号代表的身份登台，向大会作了题为《河南党务》的报告。此时，父亲兴奋异常，就在自己最心爱的端石圆砚上，自写自刻篆体《日月砚》一篇。文曰：

甲子岁首游粤市，于古肆买此端石，因其圆像日月，遂意谚有“甲子年前日月砚”之语，而吾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开，适应乎谶盖应铲除军阀与帝国主义者。从此“三五”实现得见天日乎！吾乃志喜，因斯名砚。

父亲还在大会代表合影的照片上，挥笔写下七言诗一首：

①据《河南文史资料》总第40辑刊登的胡景通所著《追忆樊醒民将军》一文称：“陈炯明叛变了中山先生，归附了吴佩孚。吴为了援助陈炯明，即令赵倜派常得胜师和樊钟秀部开往广东。樊钟秀一人粤境……即举义旗，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统率的革命军……遂被孙中山先生委任为豫军讨贼军总司令。”1924年9月，孙中山先生“在韶关誓师北伐。樊钟秀被任为建国豫军总司令……”

奔走呼号卅四年，
而今代表到南天。
造成三五拼腔血，
继续前贤觉后贤。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下令筹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任命蒋介石为筹备委员长，并于2月1日任命王伯龄、李济深（由邓演达代）等人为筹备委员，当即在各地招收学生。因当时国民党在北方处于秘密状态，不利于公开招生，所以孙中山先生就指派国民党一大代表回原籍招生。我父亲和刘积学回到河南后，立即找到中州大学（河南大学前身）语文老师魏松声（老同盟会会员），让其推荐德才兼备的进步青年。其中，王之宇、侯镜如就是经我父亲写信介绍去黄埔军校学习的。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我父亲以国民党元老及河南代表的身份，奔赴北京参加了守灵、追悼仪式。他以悲痛的心情，挥笔写了悼念孙中山先生的悼词，以表哀悼：

中山孙公	亚东伟人
革命领袖	共和元勋
艰苦一生	为国为民
三月十二	了凡脱尘
噩耗传来	惊魄动魂
山川愁残	日月沉昏
如何赎兮	人百其身
夺我先道	谁指迷津
敢告同胞	各振精神
勿负先生	一片苦心

回到河南后，建国豫军驻在临颍城内，部队很快扩大到五路，

樊锺秀任总司令，任应岐任副总司令兼第五路司令，我父亲任建国豫军总秘书长。

1925年6月，樊锺秀在我父亲的精心策划下，创办了一所军官学校。校址设在临颍城内文庙，校长是王鼎洛，聘请了很多教官。全国各地有志青年前来报考者很多。1925年2月，我父亲随建国豫军与胡景翼的国民二军去洛阳，打败了镇嵩军憨玉昆部。

在革命斗争实践中，父亲目睹了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和封建军阀的无休止混战，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一心为国为民，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为贯彻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而奋斗的；只有由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中国才有希望，人民才能翻身，国家才能昌盛。于是，他以国民党一大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6年春，经中共豫陕区委军事委员会委员郭安宇的介绍，他在信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从不以自己是国民党元老和一大代表的身份自居，而是积极肯干，虚心学习，所以深得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不久，他受上级的派遣，回禹县担任当地的中共组织负责人，并负责禹县、许昌、新郑、密县、登封五县党组织的联络工作。他经常召集许昌的郭靖宇，新郑的胡建华，密县的樊百泉、张书印、尹光明，登封的袁毅等人，到浅井我家或城内龙庭后街老宅开会，听取他们的汇报，并总结经验教训，制定行动计划，开展对敌斗争。

为了培养进步青年，父亲就在城内自己家里成立读书会，组织青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按照上级的指示，和郭安宇等一起，发动党员和进步师生，组织了以改善人民生活、反对苛捐杂税为目的的请愿和示威游行，提出“打倒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有饭大家吃，有活大家干”的口号，揭露宋十三、宋乾元（商会会长）、王殿华等人的罪行。他还组织进步青年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向群众宣传

革命思想。他编的“土豪劣绅把持地面权，常常欺侮我青年。白天下馆子，晚上吸大烟。若不打倒他，问心实难安”唱词，在当地群众中广为流传。

父亲还自编了一出名叫《打倒贪官耿介全（实际是指当时的禹县县长全耿光）》的独幕剧，让学生在古钩台上演出。他对大家说：“你们不要怕，出了事由我负责。”为了除掉一名民愤极大的警察局长，我父亲利用贪官污吏之间的矛盾，假借县长之名，向上级报告了该局长的罪行。结果，该局长被撤职查办，而县长和局长本人还不知内情。

1927年，父亲根据上级指示，与郭靖宇、郭春官等人共同组织、成立了农民协会，刻制了印章，发展进步青年人会。会员们推举郭靖宇为农会主席。同年秋，中共党员、豫西别动队总指挥张之朴、顾效颜夫妇被国民党政府通缉，来到禹县避难。我父亲先是将他们安排到城里龙庭后街我家，后转移到浅井老家，不但在生活上给予照顾，还亲自为他们传送书信，使他们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1927年，父亲介绍进步青年艾伯良（抗日战争时期任禹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去郑州，任第二集团军政治部科员。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与我父亲有来往。冯玉祥与共产党分手后，刘伯坚去苏联；艾伯良回禹县，在我父亲领导下工作。当时，党的活动已由公开转入地下。禹县地下党组织先后在城内我家和槐荫街王伯骏家召开会议，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教育党员们要严守秘密，时刻警惕敌人的阴谋。我父亲说：“革命的失败是暂时的，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但马克思理论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大家要下定决心，坚持斗争，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

1927年，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我父亲在城内我家及田协

堂的医院里，先后成立读书会，以讲解古典文学为名宣讲马列主义理论。参加人员有田协堂、艾伯良、王伯骏、余士清、陈兆祥等。

1927年冬，父亲在浅井老家组织成立了贫民寨局，与原有的富民寨局（在村南街，为富户所成立）分庭抗礼。他以组织成员们看寨为名，教他们学文化，给他们讲不识字的害处，讲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等革命道理。每天晚上，我父亲都要发给与会者每人1斤白面。起初，家人不大同意。经过我父亲耐心解释，他们也都想开了。当我家粮食不足时，我父亲就动员富户予以支援，但遭到拒绝。于是，我父亲就号召贫民寨局人员抬着土炮，拿着武器向富户示威，并说：“如不拿粮就要开炮！”富户见贫民寨局的人多势众，只好捐出粮食来。这件事使穷人们认识到：团结起来力量大。

父亲让家人在村头山坡地里撒上菜籽，使大家都能吃上菜。他衣食俭朴，平易近人。每次回村，他都要与乡亲们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促膝谈心，向他们讲国内外形势和革命道理。他还到学校给学生讲书法和古典文学。由于他讲的话通俗易懂且寓意深刻，所以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愿意听他讲话。

每年春节回家时，父亲都要首先访问一些贫困户，问他们家的收成怎样，春节怎么过，然后让他们带上口袋去我家取粮食。有一次，本村人宋四成租种的书堂庙的庙地被县政府收回，县政府转手将地租给一名劣绅，该劣绅又以高价租给穷人。我父得知后，非常气愤，跑到县里斥责该劣绅：“你们不能任意坑害百姓，从中渔利！”并把地要回交还给宋四成。事后，宋四成拿着礼品到我家致谢。我父亲说：“你还不知道我的脾气？我办事从来不收礼，能办的就办，不该办的我也不办。你快把东西拿走，专心种地。”

1928年初，禹县县长魏宗太在县政府召开全县各界人士大
— 8 —

会。王伯骏以教育界负责人身份也参加了大会。当人员已齐但尚未开会时,我父亲站起来发表演说:“目前国民党都是新官僚、新劣绅,土豪劣绅都不是好东西。革命的不能向后转,要起来干……”县长上前劝道:“宋老,现在不是讲这个的时候。”我父亲义正词严地说:“现在土豪劣绅又重新抬头,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父亲的正义之举使得这次会议未能开成,人们不欢而散。这件事引起了王伯骏等进步青年对我父亲的同情和关心,同时也使国民党禹县党部负责人刘华杰及土豪劣绅们对我父亲产生了忌妒和猜疑。

1928年春,父亲介绍余士清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还赠给他扇子一把,并题有五言诗一首,以资鼓励:

痴心我独甚,
其愚学宁武。
不求乐中乐,
愿作苦中苦。
是非既不论,
得失亦不顾。
大胆任独行,
良心我自主。
俯仰意悠然,
慷慨是今古。

1928年2月,父亲根据上级指示,在县城自己家里召开周围几个县的中共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在禹县组织一次以庙道会、红枪会等农民武装为主要力量的暴动。经过周密的研究、部署,各县分头行动。我父亲一面派人与胡贵、张陈氏领导的庙道会取得联系;一面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提出“打倒土豪劣绅”、“分庄

分田”等口号，并把当时在农村的红枪会会员组织起来。他还亲赴城南驻军赵振江部进行动员，得到了该部的支援。

1928年3月1日凌晨，各路义军都集中到了预定地点。我父亲一声令下，禹县城四关杀声震天。守城的国民党军官马示彬惊恐万分，慌忙向上峰告急。我父亲暗中指挥起义队伍攻城，并要求马示彬把王殿华、梁乾元等93名土豪劣绅交给全县人民审判，还镇压了外逃的劣绅边壮卿。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断增援，敌我力量极为悬殊，农民起义军经过17天的英勇战斗，最终还是失败了。但是，这次起义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同时也使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

事后，反动当局怀疑我父亲是这次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就以请他协助调查为名，把他软禁在国民党军的师部，千方百计进行盘问，企图从他的谈话中发现蛛丝马迹。由于我父亲沉着镇定，神态自若，使敌人无懈可击。数日后，他们只得对我父亲说：“宋老，委屈你了，我们都是为了把事情查清。”说完就把我父亲释放了。这天正是农历四月初五，当晚我出生了。

我父亲回家后，不少存心不良的人纷纷来到我家，假装问寒问暖。他们走后，我父亲对家人说：“这些人都是挂羊头卖狗肉、阳奉阴违、看风使舵的，不可结交。我出事时他们为什么不来？”父亲给我哥取名福民，给我取名福国，以表示他立志为国为民造福的决心。

当时，禹县以刘华杰等人为首的劣绅集团，把我父亲看成眼中钉、肉中刺，一心想把他置于死地，遂密谋制定了一个狠毒的计划。他们派人拿着一封模仿我父亲笔迹的信，送给正在许昌育德中学读书的我哥，并对他说：“你父从南方回来，下车时把脚扭伤了，现住在西关店里，要你速去看他。”我哥信以为真，就跟着他们去了。

途中，我哥发现情况不对头，但为时已晚。这些人把他挟持到郊外，蒙上他的眼睛，又把他送到禹县姚店街。我哥被关在姚同庆家的地窖里，由姚每天给他送水送饭。

家人得知我哥被绑架的消息，心急如焚，遂托人四处打听消息。数日后，我家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说：“只要带足钢洋、金条、大烟，即可放人。三日后，半夜以火香为号，放在某坟供桌下。”由于索要的钱财数目太大，就是把我家的全部家产变卖也凑不够三分之一，所以一时无法把我哥赎回。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哥和姚同庆慢慢熟悉了。一天后半夜，他俩乘看守熟睡之机逃了出来。次日黎明，他们来到县城里我家。听了姚同庆的讲述，我父亲才知道这是刘华杰一伙的阴谋。姚同庆因此有家不能回，就住在我家。我父亲被害后，姚同庆怕再出意外，遂要求离开我家。我叔父给了他不少钱和衣物，然后将他送走。此后，姚同庆即不知去向。敌人的阴谋不但未能使我父亲灰心丧气，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斗争到底的决心。

1928年，父亲以国民党一大代表的身份，在禹县南街举办国民党党务训练班，聘请李天降（中共地下党员，黄埔军校第六期学生，后改名李文定，建国后曾任江苏省政协常委）、顾维均（黄埔军校学生）、陈兆祥（进步青年）等人任教员。学员是周围几个县的进步青年，绝对不收劣绅子弟。在我父亲的安排下，训练班以讲三民主义为名，向学员讲授政治经济学和社会进化史。训练班原定为3个月，后延长了1个月。这其间，我父亲经常听课、演讲。

训练班即将结束时，主课教员李天降因“共党嫌疑”的罪名，被国民党禹县县政府逮捕，关在县警察局。我父亲十分焦急，一方面让县警察局长的儿子李品一与李天降联系，一方面派人组织训练

班学生萧文荣等联名将李天降保出。此后,我父亲又让李品一通知李天降到城内我家,对他进行了安慰,并说:“你不能老老实实地等省政府的批文,可不能上当。你要马上离开禹县这个险地,不能停了,明天就要动身。我给你安排路费。”第二天一早,李天降由顾维均陪同,坐骡车离开了禹县。事后,国民党禹县党部负责人刘华杰扣押萧文荣做人质,并派人追到驻马店。由于我父亲的精心安排,使他们扑了空。

1929年1月11日,国民党禹县县政府以开会为名,将我父亲逮捕。他们对我父亲严刑拷打,软硬兼施,但一无所获。反动当局束手无策,只得连夜将我父亲押往省会开封。

我父亲被捕后,国民党禹县县长全耿光、民团军团长于振江等带领警察将我家包围并搜查。他们搜出了我父亲的国民党一大代表证书和一只箱子(内装马列主义书籍、宣传革命的小册子、党内文件、与同志往来书信若干、农协印章、报刊杂志等),并将我家的名人字画、古玩等全部抄走。敌人还将我母亲和哥哥福民扣押并进行拷打,企图从他们口中得到党的秘密,但仍是一无所获。



宋聘三故居